

当代广东社会科学家选集

• 丛书 •

奇书

杜国庠

杜国庠选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当代广东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杜国庠选集

杜国庠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钟永宁

封面设计: 杨白子

责任技编: 梁 智

当代广东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杜国庠选集

杜国庠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 广州市光复中路270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2插页 28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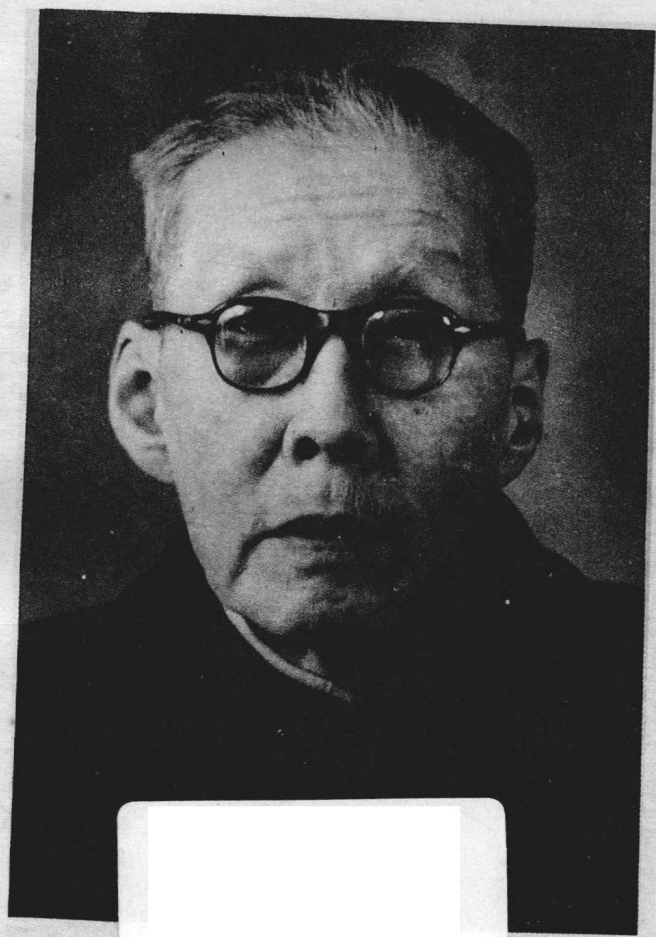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218-01577-8/K·347

定价: 15.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得是辯論工人，不遵道義，而一意氣用事，斷手截
 趾，以破我而卒卒鳴的振聲，那才可恥，

邏輯——發現而邏輯——主觀的邏輯，因此邏輯
 有些界性，全人類性。因此，用任何邏輯，或三派
 論或四派三派或一，都可以把兒童觀出來，就是
 “以派出校的方式也一樣可以，而此國或全子三
 所施的格式便值日行著，——這種格式也是發脫
 不了邏輯的累向。

我對於星宗史思想思想的看法。

星宗史思想思想。
 所謂“星宗史思想”之說，其本意，在星宗史
 （因為新在星宗史之新，其本意，在星宗史）
 還有說本以星宗史。）
 星宗史思想思想。

星宗史思想思想，其本意，在星宗史。
 上文指出，星宗史思想思想，其本意，在星宗史。
 （星宗史思想思想）

《当代广东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出版说明

当代的广东,产生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和优秀的学术成果。这是一笔宝贵财富。为了纪念和表彰这些卓有成就的学者,为了用他们作榜样激励后人,同时,也为了给学界同仁、广大读者了解、研究、学习他们提供参考和帮助,我们决定编选这一套《当代广东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我们希望,这一工作能够起到推动广东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我们祝愿,广东社会科学事业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生气蓬勃,前程似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是广东籍或者长期在广东从事研究、教学工作的,具有全国性影响、成就卓著的知名学者。

二、丛书选收的文章、论著,必须是有代表性的,力求能够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对于长篇论著一般采取节选。

三、丛书初步拟定每年出版1~2种,每位社会科学家编选一集,每集25万字左右。

四、每部选集有一篇简述社会科学家生平事迹、学术道路、

成就影响的前言，并附有社会科学家的照片和手迹等。

本丛书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由于水平所限，编选中有不当不妥之处，尚祈读者予以指正，共同把这套丛书出好。

即期出版

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概论

杨 越 蒋祖缘

杜国庠同志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整理和研究中国思想史卓有成绩的学者之一。他涉猎的学术领域广博，钻研的学术专业湛精，是一位渊博而深精的学问家。他早年攻读中国古典文学，能诗善文，研习《说文解字》及于乾嘉训诂之学，又从王阳明的《传习录》入门，跟踪禅宗，研究佛学，从而进入哲学研究领域。1907年东渡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读政治经济科，得聆河上肇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熏陶。1919年毕业回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从日文翻译出版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准备工作，40年代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1943—1944年，即已写成《论公孙龙子》、《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荀卿与韩非的思想关系》、《论荀子成相篇》等多篇论文。他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遗产和纷似葛藤的中国历史思潮中，理出先秦诸子思想的来龙去脉，各家的思想体系，以及家与家、派与派之间的相互关系。郭沫若悼诗有“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

传”之句，就是对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研究造诣的相当评价。

杜国庠研究中国思想史，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而以先秦时代为重点。他关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专著，以及《从荀子的成相篇看他的法术思想》、《荀子对诸子的批判》、《阴阳五行思想和易传思想》、《杂言家之始作者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等多篇论文。这些著述，包括自孔子到韩非子，即自春秋末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的主要代表者。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先秦诸子思想影响很大，几乎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前，各家各派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宗于这一思想体系；而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又是入门不易，探微尤难。杜国庠以他渊博的学识，必备的古文字修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不畏艰难，正本清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史要“先把源头搞清楚”。他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既着力于还诸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又精心寻找诸子思想发展的规律。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的《绪论》中，他断言“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一种好象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间有着某种斩不断的葛藤”。因此提出“研究诸子的思想，必须‘知人论古’地从这些葛藤中间去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的真面目”。这可以认为就是杜国庠从总体上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自

白。他被确认为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当然不仅是从这个总体而言,而且体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所作的一系列的研究。

这部《杜国庠选集》收入的著作,无疑处处闪烁这种思想的光辉。

杜国庠在他的这些著作里,对先秦诸子思想作了透辟的分析,准确地勾画出诸子思想最本质的特征,如实地反映了各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墨子的中心思想是“义”,孟子思想最突出的是“仁义”,荀子思想最突出的是“礼”,然而荀子扩大了礼的内涵,至少也与“法”相等,架起了一座从儒到法的桥梁,韩非子思想最突出的是法、术、势,而以法为中心,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宋钘、尹文是“虚而无形”的“道”的观念,公孙龙的哲学是一种多元论的唯心主义,在论辩问题上被视为诡辩,墨辩的认识论是一种无穷地去接近事物的科学的认识论。他极其鲜明地概括出诸家思想的特征,就如同画家画人的脸谱,只需要那么几笔就把各种人的不同脸型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来。这对画家来说,需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和善于区别各个人的不同脸型;而对于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则需要有很深的学术根底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善于从各家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中去辨别、发现、把握其本质的东西。杜国庠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对先秦诸子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

墨子、荀子、墨家后学、公孙龙的研究更具独到的见解,使这些思想家模糊不清的脸型——这些思想家的精神面目,能够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杜国庠是“抑孔扬墨”的。但是,他没有完全否定孔子,而是一分为二地肯定他认为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他认为应该否定的东西。他肯定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大家”,把官学变成了私学,把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到民间。他肯定孔子提倡“爱人”的“仁”,已经看到庶人阶层的抬头,是“孔子进步的一面”。但是,孔子仍然强调“礼不下庶人”的礼,从而在孔子思想中,“落后的因素,终究超过了进步的因素”。孔子还是守旧的。他认为,当墨子发见了儒家的礼,烦文缛节,不是一般民众所可行,厚葬久丧也不适于当时的急务,他非儒而提倡节用节葬、尚贤尚同等主张,以求“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抑孔扬墨”,决不是出于主观的偏见,而是有着一个客观的标准:“抑孔”,是抑孔子的守旧;“扬墨”,是扬墨子以自己的学说,“自动刻苦去替老百姓办事”。事实上,他关于孔子思想“守旧”的论述,很值得我们记取。从儒家的开山祖孔子到后来的正统儒家的思想,“守旧”可以视为是一条一脉相承的主线。

杜国庠对荀子的研究,高度重视荀子的《成相篇》。他认为《成相篇》的真伪问题对荀子思想研究,极关紧要。正是这种要把事情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的求实精神,他考证了这篇著作出自荀子的手笔,肯定它在思想上是荀子“晚年自写的思想大纲”,足以代表荀子晚年成熟的法术思想,在文学上具有独创的风格。这一重要的考证,使他对荀子的法术思想的立论建立在翔实的材

料的基础之上,不仅丰富了先秦哲学史和先秦通俗文化学史,而且他的考证和立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三

名家与墨辩,是先秦诸子研究中最为棘手而向来被认为很难理正的。晋朝人董胜在《墨辩注》的叙文里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自邓析到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解,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有。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而宋濂在《诸子辩》中则谈到他读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喻,坚白同异之言,终不可解”。他读不懂公孙龙的书,很想赶快把这些书烧掉。但是,《墨经》和《公孙龙子》在先秦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不可让它亡绝和令后人不明其真意的。杜国庠全面而深入地掌握名家和墨辩的思想资料,认真地对墨名绝学作了研究,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和《论公孙龙子》的论文。论文里既肯定了董胜的“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的说法,“确是启发了近世单独研究《墨经》的一些法门”,同时又指出董胜把墨经说成是墨子自著和惠施、公孙龙祖述《墨辩》的见解,“却并不高明,尽管还有人在信奉它”。他用大量事实论证《墨经》并非墨子自著,惠施、公孙龙也没有祖述《墨辩》。《墨经》的真正作者,是墨家后学。在此基础上,杜国庠对公孙龙的诡辩和墨辩的科学认识论作了很有力的剖

析。他认为，公孙龙的《白马论》已经指出马、白及白马是三个可以独立分离的共相（指或物指，也即概念），而墨家则不承认概念是可以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公孙龙的《坚白论》的“藏”，并不是藏于白中，而是坚白的“自藏”，即是共相的独立存在，而《墨经》的所谓“存”，是存于事物之中，和公孙龙的“自藏”根本不同。他对墨家所见的认识，肯定“是一种无穷地去接近事物的过程”，是一种科学的见解。对公孙龙的诡辩，在说明其离开现实，违反常识，也违背真理的同时，他并不以公孙龙思想中的瑕而掩其瑜，肯定公孙龙终究建立了纯逻辑的正名实的理论，这点功绩是不可以埋没的。所以，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的《名辩》章中，他一开头就指出：“就是那些所谓‘诡辩’，……对于当时的逻辑也未尝没有某些积极的贡献；那不能简单地用‘诡辩’二字把它全部抹煞了的。要紧是把它们放在整个的学术思想的发挥中去观察，看看先秦逻辑思想有了怎样的发展路线与成就。”

从方法论来说，杜国庠先秦诸子研究之难能可贵正是因为他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使他大量地而不是零星地占有材料，并且对某些重要材料进行必要的考证；使他的研究没有先入为主和以偏概全的弊病，而是在占有翔实材料的基础之上，对全部材料进行系统的周密的分析和综合，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使他能瑕瑜互见，而不以瑕掩瑜。

四

杜国庠对先秦诸子不是一个一个地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是

根据诸家思想的实际,科学地理出了一条各家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以及家与家,派与派之间的斩不断的葛藤。而这条葛藤一经他理出之后,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递嬗的关系。他指出,先秦早期的儒墨两家都是著名的学派,但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原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后来才分道扬镳成为与儒家相反的显学;稷下黄老学派宋钐、尹文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少调和儒墨两派的痕迹,正因为他们采取了调和儒墨的态度,才使他们的思想容易给儒家孟子、荀子以极深刻的影响;孟子受了宋尹的影响,而把孔子“性相近”的见解,发展为性善说,因而给与“仁义礼智”等德目以先天的根据,并以之养其浩然之气,走向神秘的唯心主义;荀子唯物地接受了宋钐的自然天道观,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富于唯物主义因素的。荀子的礼论,大体虽继承着孔子的思想,但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法术思想也占荀子思想的重要部分。他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做了由礼到法的一座桥梁,给韩非奠好了法术理论的基础。此外,惠施有道家的倾向,公孙龙的“指”与惠施的“小一”有着内在的渊源。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杜国庠在先秦诸子研究中,科学地揭示出了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其意义当然不只是把握一家、一派、一人思想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这一基础上,进而从驳杂纷纭的思想现象中对先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杜国庠在先秦诸子研究中,理出了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递嬗关系,并从而揭示出先秦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这从方法论来说,就是由于他在研究工作中,紧紧地把握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运用到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从而发现“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发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这种有机的组织,在杜国庠的先秦学术史著作里绘织成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画面。这幅画面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交错和发展中,形成杜国庠的关于先秦思想发展史的学术思想。

五

杜国庠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总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把当时各家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他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中说:“大凡在思想史开端的时候,各家的思想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的。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制限,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这段话明显地道出了诸家的思想认识总是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各家都想以自己的学说去推动或影响当时的社会变革。正是他娴熟地把握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总是把诸子思想放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即他所说的“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中去考察。他对孔子思想的“限界”,就是“从孔子所处的社会去找说明”。他认定墨子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都是针对当时小国所发生的弊病而对症下

药的。他说：“读墨子的书，就须联系着他的社会背景来研究，凭空地下批评，未有不犯错误的。”他对荀子的研究，认为荀子处在“社会变革，日近成熟”的时刻，所以反映于荀子的思想，“便形成了由礼到法的过渡形态。”他对公孙龙的研究，认为战国时代，七雄并立，周室衰微，大家各自称王而又不能统于一尊。当时这种政治的社会情形，反映到公孙龙的脑子里很自然使其哲学停留在多元论的阶段。他还指出，在战国那个社会剧变的时代，游谈纵横之士乃至贫贱之士所表现出来的独立自主视富贵为己所有的心理，反映于公孙龙的哲学，“就成为‘指’的互离而独立自主藏乃至‘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的看法”。当时“战乱之世逼迫人们睁开眼睛去看现实，这是很自然的事体”。而这也正是公孙龙的“正名实的见解之所以拿‘实’做标准的缘故”。

杜国庠对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剖析做到了缕析入微的地步。这种缕析入微，无疑是紧紧把握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即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状况和变动以及各个阶层的变化与心理表现。换言之，即把握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总和。没有对历史的精通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造诣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杜国庠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就方法论来说，正是由于他紧紧把握住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在他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地步，才使他对先秦诸子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分析，显得非常贴切。

杜国庠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还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在《庄子》章里，他把宋钘的言论与庄子的言论作了比较；在《荀子》章里，他把荀子的礼与孔子的礼作了比较；在《韩非子》章里，

他把荀子的“势”，慎到的“势”与韩非子的“势”作了比较；在《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里，他把公孙龙的思想与墨辩的思想作了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发展。他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诸子思想，不仅可以在更深的层次揭示诸子思想的异同和便于把握诸子思想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先秦思想史发展的系统认识。

六

杜国庠在先秦诸子研究中，敏锐地洞察出诸子“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因此，他认为“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这实际上是肯定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与当时社会变革的关系，还诸子思想的真面目。这既是他研究先秦诸子的真知灼见，又反映出他从事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不过，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他反对庸俗的实用观点，反对牵强附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他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始终坚持这一态度。在墨子研究中，他突出地提出墨子的“择务从事”的要旨，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等重要因素构成墨子整个思想，又以“天志”为贯串整个思想的线索，形成整个思想的体系。这样，一下子就梳理出墨家这些主张虽各明一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什么“学儒者之学，受孔子之术”的墨子终自成家，就可了然